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

韩彬 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院博士科研基金《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编号：2014BS24）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

韩彬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韩彬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5161-6546-1

I. ①现… II. ①韩… III. ①作家—自传—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210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0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房福贤

由于文化上的原因，自传在我国尚不发达。虽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等经典之作，但现代意义上的自传作品很少。五四以后，由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提倡，自传始得较快发展，出现了《沫若自传》、《达夫自传》、胡适《四十自述》等作品，进入30年代，自传的写作与出版甚至形成了一个热潮。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自传却出现了沉寂。新时期以来，自传再次复兴，并显现出蔚为大观之势，引发了新一轮的冲击波，并在销售上呈现出空前的火爆局面，《王蒙自传》一开始即以30万册起印，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也红火一时，其影响不下于他的《文化苦旅》等散文。在精英文学不景气的今天，自传的繁荣为出版界打开了另一扇“芝麻之门”。自传为什么难免再次兴起？这与当下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很大关系。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心理和工作负担的加重，大众读者在空闲之余迫切希望得到更多一点的精神消遣和精神享受，而传主以亲切、自然的口吻娓娓道来地叙述自我的人生故事、成长经历，能够满足读者心理补偿的需要。再加上读者面对周围纷扰的世界会有许多的怀疑和无奈，他们迫切需要从别人的经历中找到人生的启迪和成功的答案，并且通过他们的传记，也能够满足他们了解传主的渴求。于是，传记文学以它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社会经历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然，自传文学的发展还有一个强大的内驱力，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的使命承担意识和诉说欲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以往的历史中积累了太多的话语需要言说，

也积郁了太多的苦闷和痛苦，迫切地想诉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社会体验，希望通过自己的诉说获得一种价值认同和心理渴求，也希望能够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这种强烈的诉说欲望和干预社会现实的使命感，也促成了大量自传的问世。尽管自传已经成为文坛的一个热点现象，但当今学界对此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关注研究者不多，自传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匮乏，尤其是从整体上对 20 世纪中国作家自传进行的研究性著作基本属于空白。值得庆幸的是，韩彬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的出版，终于可以打破“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这种状态了。

韩彬的这部专著，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修改而成的。比之她的博士论文，这部即将出版的著作内容更丰富、材料更充实、结构更完整，有了更多的学术性、理论性与创见性。我在重新阅读的兴奋中，自然也想起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事情。当年韩彬跟我攻读博士学位，准备博士论文题目时，她提出要作一个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研究课题，理由是我曾经研究过作家传记文学，作为她的导师，指导起来更有针对性。但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当时对此想法不仅没有予以支持，反而泼了一通冷水。因为我曾经研究过作家传记，深知自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但自传研究却不容易搞。首先，自传作为一种文体，虽然有着极其古老的历史，但古今中外的自传理论却几乎没有，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无法相提并论。其次，自传的生命在于真实，但确定一部自传作品是否真实，对研究者来说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并不是靠一种合理的推断、想象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次，自传总被看作对传主过往人生的一种再现，因此其文本往往有着比较固定的形式，写作上采用的是最为老实本分的线性叙事，很难像虚构性作品那样进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判断其艺术价值的参照系比较单一化。这也是当代中国传记（包括自传）非常繁荣而研究却十分冷清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并不赞成她以自传作为研究课题。我的态度让韩彬有些意外，但她并没有跟我争辩，只是答应回去再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们又一次相约讨论她的论文题目。本来我以为她会换一个课题，没有想到她还是坚持要作自传研究，并且还给我整理了一份一万余字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综述》。她说经过认真的思索，

觉得还是可以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因为难度大，所以可借鉴的资料少，但也正因为资料少，也才有了发挥的空间。她还是想试一试。知难而进，是一个学者非常重要的品格，我不能打击她的这种执着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里已经不多了，我必须支持！虽然我仍然有些担心，但我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想法。事实证明，她的坚持是对的。如果没有当初的坚持，这部颇有思想价值与学术含量的专著，今天也就不会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作为一部研究专著，《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哪里呢？毫无疑问，首先是它的开拓性。作家自传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它却几乎成了学界被遗忘的角落，很少进入“现代中国”的学术视野，迄今为止，竟然没有出现一部对其系统、全面、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韩彬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的出版，无疑是对这一现状的大胆突破。当然，开拓新领域，不仅仅需要大胆创新的精神与不畏艰难的勇气，更需要开阔的视野与发掘的功夫。需知，在前人研究成果几乎阙如的情况下，将有百年历史的自传写作进行条分缕析，纳入一个大的学术框架中，是有着相当大的难度的。韩彬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经有过担心，怕她驾驭不了这种宏观的历史叙述。但是，通过对历史复杂现象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她不仅很好地把握住了历史的脉络，并通过她很有新意的话语把它表述了出来。比如她对近百年中国作家自传历史的四个分期，就是非常准确的概括，而无论是勃兴、沉寂、缺失还是黄金时代的原因分析，也都符合时代的真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展示时代对自传写作的影响，韩彬还将特殊时期比如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准自传文本如文学性自传、日记、政治运动的交代材料等进行了深入发掘，并大胆地将它们置于历史的叙述中，不仅成为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史的有力补充，更建构出了一段令人深思的作家心史，这显然不仅仅是写作上的技术行为，更是韩彬作为一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深入体察的结果，如果没有对历史、对人生、对人性的多方面的理解与感悟，没有大胆的开拓精神与创新意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的学术意义也表现在它的理论建构上。人

们之所以喜欢读自传但却不大愿意涉足于自传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跨越真实性这一核心问题，从理论的高度上对它进行形而上的把握，因而总是局限于就事论事的低层面而不能自拔。为了打破这种无法突破的困局，韩彬大胆地将身份理论引入作家自传研究中，以身份建构为视点，探讨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避讳、夸饰和辩解的关系，为自传真实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自传总是依据一定的身份进行写作，自传书写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写事实上都决定于传者对传主的身份预设。自传的真实与否，何者需要如实讲述，何者需要避讳夸饰或自我辩明都与作者对传主的身份预设密切相关。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之所以有勇气坦陈自己生活中的卑劣想法甚至是下流行径，正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预设是个性解放者，他所要做的正是对抗世俗的虚荣矫饰。他越是毫不保留地坦陈自我，他也就离自己的预设身份越近。同样传者之所以要避讳某种生命经历，正是因为它会损害自我的身份预设。茅盾讳言与秦德君的恋情，余秋雨极力辩白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白，周作人对日据时代自己的言行颇多黠辩之词，这些讳饰、黠辩都与作者自我的名人身份预设紧密相连。因此可以说，自传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我形象的塑造而非再现。作者如何塑造传主形象，不仅取决于传主的真实自我，更与传主的自我意识和身份预设密切相关。有关身份理论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但运用于自传研究中并不多，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尝试。身份预设理论的提出，使人跳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真实与讳饰的怪圈，对自传的特点有了本质性的理解，有效地解决了以往人们难以解释的一些问题。对作家自传中的身份预设问题的这种认识，我认为是韩彬作家自传研究中最有创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对作家自传研究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对所有的自传甚至是所有的传记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与方法论启迪。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的学术意义还表现在它将不可靠叙述的理论与方法引入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一般认为，自传是一种不需要叙事技巧的文体，它只需要忠诚地再现过去即可。但是事实证明自传不可能是对传主自然生命事无巨细的描摹，因为传主写作之初就有一个身份预设，因此，他必然地要对其过去经历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重构。怎样来解释自

传写作当中的这种现象？韩彬非常巧妙地借鉴了不可靠叙事理论与方法。不可靠叙述是韦恩·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主要针对的是小说等虚构性的叙事文本，在自传、回忆录等纪实类文本中是不是也存在着不可靠叙述呢？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韩彬认为，事实上在自传中也存在着不可靠叙事，只不过作为虚构性文类的小说其不可靠叙述的探讨基本限制在文本内的考察，而作为纪实性文类的自传其不可靠叙述的研究则由文本内世界延伸到文本外的“真实世界”。为此，韩彬提出了三种不可靠性叙事的观点：即文本内的叙述间隙，文本间的叙述歧义，自传文类的叙述间隙。我认为，将不可靠叙事引进自传研究中，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也是自传叙事研究中的一个突破。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提出一种理论不容易，将其付诸实践更难。不可靠叙事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具体到一部自传作品中，怎样去区别分辨其中的不同，则需要相当的学识与功力。韩彬的自传研究，不仅表现出了很高的理论视野，也同时表现出了很强的解读功力。比如在分析文本间的叙述间隙这一不可靠叙事时，她以《王蒙自传》、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以及方蕤的《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为例，对王蒙的形象在文本间的叙述间隙进行了精彩的分析。王蒙《半生多事》和从维熙《走向混沌》同时描述了他们在担石沟的劳动生涯，但在这两个文本中读者所看到的王蒙却有很大差异。在《半生多事》中王蒙更多表现的是自己的通达和乐观，而在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中却难见这种通达和乐观，更多的是一种近似冷酷地对事势的理性认知。王蒙的《半生多事》与方蕤的《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都提到崔瑞芳 1961 年 5 月 1 日到三乐庄休假探亲，但王蒙的记述是自己为她的到来激动流泪而又神经紧张，面红耳赤而又无地自容，而在崔瑞芳的记忆中的王蒙则是“表情平平，没有一点儿喜悦的神色”，而且心事重重，显得颇为犹豫和紧张。文本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呢？到底哪种描述更符合实际呢？如何认识这种不可靠叙述呢？为此，韩彬通过文本间形成的间隙进行了细致、周密而又合理的阐释。王蒙在自传中的表述之所以与他人不同，主要是因为王蒙有着成功者的心态，当他以这样的心态回顾过去的时代，历史的苦难在悄然不觉间被当下的幸福置换了，作为经验主体的痛感

也就变成了自我内心的澄明和洒脱。然而，从维熙和崔瑞芳的叙述却让我们窥见了一个他者眼中的王蒙，也许任何一个历史主体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存在，所谓的澄明和洒脱，不过是一种事后的想象，而这种想象的代价则是削弱了自传叙述的可靠性。面对王蒙现象，或许你还会有别的理解，但你不能不佩服韩彬于细微处破解历史密码的分析能力，正是从这些文本间形成的间隙中，她竟然为我们发掘出了这么精彩的人生。可惜的是，当下学界那种认真阅读细致分析的学风已经越来越淡薄了。

重新阅读韩彬的《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不禁再次为她当年的坚持而庆幸，这确实是当代中国传记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力作！但是我也深知，韩彬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有着多少辛勤的劳动与苦涩，也许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到。韩彬是在高校工作几年后才重新考入母校攻读博士学位的，抛下才两岁多的孩子，再次背起书包当学生，对她都是一个新的考验。那时，她经常在胶济铁路或济青高速上来回穿梭，也经常在博士、母亲和教师的身份中不断变换，其辛苦不比寻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工作关系，她刚刚入学不久，我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地给她上课，我就离开了曾经学习工作过大半生的学校，远走天涯海角，从此我们师生远隔千山万水，我对她学业上的指导也变成了南北两地的电话或邮件交流。虽然现代化的设备为我们的交流提供了极大方便，但这种交流毕竟与面对面的谈话不一样，有时指导并不及时到位。由于路途的关系，有时必须参加的一些活动也就能免就免，比如论文开题与预答辩时，我都没能参加。当她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最需要指导老师在现场给予精神支持的时候，我又因为到北京参加一项特殊任务未能出席，至今想起来还颇有愧疚之感。好在韩彬基础扎实，学习又非常努力，不仅没有埋怨我，还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让我这个远在天边的导师有了些许安慰。羊年春节前夕，韩彬电话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经过几番修改后即将出版，并要我为之作序，我很高兴，学术之路上，又有一名年轻的学子坚定地走过来了。于是，伴随着春节期间喜庆的爆竹声，我写下了有关韩彬和她的书稿的一些感想。作为老师，或许我对韩彬有些偏爱，但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对她的书稿的评价是真实的、客观的，绝无半点溢美之言。读者

诸君如若不信，不妨认真地读一下，相信你一定能够从本书的阅读中得到一些收获，不管你是专业研究人员，还是普通的读者。

是为序。

2015 年 3 月 5 日于海口怡园

引言

自传是一个兼及文史的文类，中国虽然历来史传文学都很发达，但是自传文学则一直处于贬抑之境。直到进入 20 世纪以后伴随着人的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卢梭《忏悔录》等西方经典自传作品的传入，具有现代意识的自传逐渐发生发展起来。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和 80 年代以来出现了自传写作的两次高潮。但是与自传写作出版的繁荣相比，自传研究则一直处于冷僻状态。自传研究之“冷”首先源于自传本身难以界定。那么何为自传？从广义上来说，有的论者和作家认为一切作品都是自传。如法国作家法朗士说：“所有的小说，细想起来都是自传。”福楼拜认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卢梭则说：“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我的自画像。”^①郁达夫也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种论断证实了作家作品中总是内蕴着作者个人的生命痕迹，但是从文类的角度来看却混淆了自传与小说的本质区别，忽略了自传作为一个独立文类的存在。第二种对自传比较宽泛的定义为一个人所写的关于自己的传记。如《辞海》为自传下的定义是“自述生平之作”。1866 年，法国权威的《拉罗斯百科全书》将自传定义为“由某人写作的其本人的生平”。德国学者乔奇·米希认为：只能概括“自传”一词的含义来给它定义——由一个人自己（auto）来描述（graphy）此人的一生（bio）。^②这类定义都强调了自传作为传记的从属性以及

① 转引自〔法〕菲利浦·勒热讷《自传契约·译者序》，杨国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 页。

② 转引自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2 页。

其外部特征为自述生平。这种定义虽然笼统，但较少争议，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叙述弹性。第三种比较经典的定义是法国学者菲利浦·勒热讷 1971 年所提出的，他认为：“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① 这个定义指出了自传的几个基本特点：自传是作者的自叙，其采用的一种回叙性的视角，强调的是一种个体性的书写。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将自传与回忆录、自传体小说、日记等相似体裁作了区分。这个定义虽然也受到一定的非议，尤其是后现代作家自传文本的解构，但至今仍为广大研究者所引用。第四种是否认自传的可定义性和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存在。欧尔尼就曾指出：“尽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自传。却没有两个人有一致的看法。”他认为给自传作出规范性定义或文类界限是不可能的。中国台湾学者李有成也认为：“自传所涵盖的文本既是如此繁杂广泛，要自传下一个有意义的定义实非易事，因为有不少例外和变体逾越此一定义所划定的疆界。不仅如此，这个事实也使得如何举例或指认自传文本难上加难。这些困难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何以我们无从陈述自传的内在形式，但同时也宣示了，对自传作者和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文类。”^② 原型批评家弗莱指出：“自传是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一系列难以察觉的等级同小说合为一体。大多数自传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因此也是虚构性的冲动所激励，作家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选择事件和经验构建成一个综合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比作家本人更大的东西，他却把它和自己同一起来，或简单地说，同他的性格和看法一致起来。”^③ 保罗·德曼也认为：“从经验上和理论上，对自传本身进行种属界定的可能性少得十分可怜；而对于规范来说，每一具体例证又似乎均有例外；（自传）作品本身的色彩仿佛总是淡入邻近的或者无法协调一致的文类。或许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对于悲剧或小说而言，极具启发价值的种属讨论，在自传来说，却依

① [法] 菲利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3 页。

② 李有成：《论自传》，《当代》（台北）1990 年第 11 期。

③ 转引自杨正润《自传死亡了吗？——关于英美学术界的一场争论》，《当代外国文学》2001 年第 4 期。

然贫瘠荒芜而令人心情沉重。”^① 美国理论家哈桑甚至论断了自传的死亡。自传的难以界定性显然不意味着自传文类的消亡。自传消亡说是“失误于脱离实践、也脱离文学的历史传统”。“以纯粹的理论演绎取代自传家的实践。”^② 纠缠于什么是自传正如纠缠于何为文学一样，一切一目了然的名词都很难给它一个精准的定义，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为我们研究对象的范围作一个大致的界定。笔者倾向于以勒热讷的自传定义作为本文对自传讨论的范围，但是勒热讷强调自传为个人个性历史的书写，由此将回忆录排除在外。正如张瑞德所说：“回忆录和自传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较重视作者身处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而较不重视个人的私生活，有时作者甚至很少提到自己，……不过一般说来，自传和回忆录在中国的分别并不太大，通常用‘自传’这个名称的较少，而用‘回忆录’的较多。”^③ 也就是说自传与回忆录在中国并无特别明显的区别，中国人自传的书写往往与社会与历史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笔者将侧重写个人的回忆录也纳入本书探讨的范围。另外，本书的论述还涉及了少量日记文本，虽然日记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因为它缺乏一种回顾性的叙事视角和对整个或某段生命历程的整体书写，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成为一种准自传的参考文本，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作家自传书写受到压抑，呈现整体性缺失的年代，对某些准自传文本的探讨有利于对20世纪自传发展历程的整体建构。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所谓“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参照，指的是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它涵盖了通常我们文学史所叙述的“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段。因此凡是创作于现代中国的作家自传都在我们的考察之列。

① [美]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失去原貌的自传》，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② 杨正润：《自传死亡了吗？——关于英美学术界的一场争论》，《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4期。

③ 张瑞德：《自传与历史——代序·中国现代自传丛书·资平自传》，（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民国78年版。

目 录

序	房福贤 (1)
引言	(1)
第一章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流变研究	(1)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勃兴(1927—1937 年)	(3)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沉寂(1937—1949 年)	(16)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缺失(1949—1978 年)	(22)
第四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又一个黄金时代(1978 年—)	(36)
第二章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研究	(48)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寻求认同	(50)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	(63)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	(75)
第三章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叙事研究	(85)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不可靠叙述	(87)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对话性	(97)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故事性	(107)
第四章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主题研究	(117)
第一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婚恋主题	(118)

第二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反思主题	(135)
第三节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励志主题	(154)
结语	(163)
主要参考文献	(181)
后记	(191)

第一章 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流变研究

自传文体古已有之，但是中国人讲究生不立传，清代王韬在他的《弢园老民自传》中就指出：“生而做传，非古也。”而且儒家的礼制秩序和宗法文化中的家族本位主义，压制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个性的张扬，因此自传在古代中国并不发达。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指出：“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述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①事实上屈原的《离骚》并不能称为自传，而司马相如的《自叙》在流传中业已遗失，因此我们当下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自传雏形乃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后东汉班昭《女诫·序》、王充的《论衡·自纪》、曹丕《典论·自叙》、东晋葛洪《抱朴子·自叙》、唐代刘知几《史通·自叙》、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刘鹗《老残游记·自序》等都是以书序的形式出现的自传性作品，可见书序应为中国古代自传存在的原初形态，这类自传依附于作者的著作而存在，并无明确为自我做传的意识，而主要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其著作。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就曾指出：“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②古代另一类自传往往以号为其书名，像东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唐代

①（唐）刘知几：《史通新校注》，赵吕甫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页。

② 冯友兰：《自序·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页。

王绩《五斗先生传》、白居易《醉吟先生传》、陆龟蒙《甫里先生传》、欧阳修《六一居士传》等，这类自传不叙传主的姓名、籍贯、生平，所述的时间和空间幅度都非常有限，缺乏对传主生命历程的书写，而主要是对传主性情的一种静态描写。此类自传并不说明传主与作者的关系，对它们作为自传的指认，往往是建立在读者了解作者生平后的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类自传超越了现实的胶着，不写传主的实然之象而写其应然之象，而这种实然和应然又常常混杂在一起，真伪难辨，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只能是一种类自传。中国古代最早以自传为名的是唐代陆羽的《陆文学自传》，这篇自传叙述了传主的相貌、特点以及简述了其生命历程，虽然受篇幅所限，但是其基本的生平都已交代明白。其后刘禹锡《子刘子自传》、清代王韬《弢园老民自传》等亦具有比较明晰的对生命历程的书写，因此这类自传最接近现代自传文体。古代还有一类自传，是作者生前为自己所作的墓志铭。墓志原为放入逝者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志，主要记载逝者的姓名、籍贯、官职、公德等，铭则主要抒发对逝者的悼念和褒扬。因为中国古代讲究生不立传，盖棺定论。因此撰者则借墓志铭的形式对自我一生做出评价，使自己的生平事迹流传下去。自撰的墓志铭如唐代王绩《自撰墓志铭》、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韩愈之子韩昶《自为墓志铭》、杜牧《自撰墓铭》、徐渭《自为墓志铭》等，在这类自传中传主除撰写了自我的生平，同时还书写了面对死亡的感受。

中国古代自传与现代自传相比只是初具自传文体的雏形。首先，它受文言载体所限，大都篇幅比较短小。中国古代大部分自传都短至千言，较长的东晋的《法显传》也不过 13980 字，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是一个个例。《浮生六记》全篇分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其中后两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则被疑为伪作。《浮生六记》每一记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不同的生活片段，充满了个人的生活细节的描述，这是前人自传所不及的，沈复及其妻沈云的形象更是跃然纸上，这对现代自传的撰写是很好的借鉴。其次，受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人压制个性的张扬，个人意识匮乏，因此往往以史传的笔法来作自传，采取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以免自炫自夸引来非议。最后，中国古代自传缺少对自我